

## 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彭马田《尚书》英译研究\*

沈思芹\*\*

### 目 录

1. 引言
2. 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语境
  - 1)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
  - 2) 大众文化产业的兴起
3. 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 1) 译文形态趋于简化、拟像化
  - 2) 译文诠释深度消失、趋于平面化
  - 3) 译文能指与所指趋于分裂
  - 4) 英语大众读者对中国经典译文的距离感消失
4. 彭马田《尚书》英译对翻译伦理的背离
  - 1) 翻译伦理与《尚书》的诠释传统
  - 2) 彭氏《尚书》英译对翻译伦理的背离
5. 结语

### 中文摘要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尚书》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其作过诸多诠释与传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在大众文化产业的影响下，当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的《尚书》英译消解了原文的思想文化负载与蕴含，其译文显示出对原文的诠释深度消失、平面化、简化、拟像化，以及使西方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译文的距离感消失等后现代主义文本特色。彭氏《尚书》英译对原文的忠实度较低。

\*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20FYB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背离了翻译伦理，不利于英语读者对《尚书》所载中国文化的理解。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经典的翻译，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国文化的真实传播等，皆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彭马田；《尚书》；中国经典；后现代主义；翻译伦理

## 1. 引言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具崇高的地位，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元典之一。《尚书》由公元前二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政史资料汇编而成，其篇目多为“上古君王的军政诰令”、“君臣间的谈话记录”。<sup>1)</sup> 自17世纪起，不同时期的西方汉学家等即以不同语言多次翻译《尚书》，产生了《尚书》的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等译本，当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Martin Palmer)的《尚书》英译即是其中之一。彭马田也是一位主持人、作家、宗教历史学家及环保主义者，曾被英王聘为中国文化顾问。近年来，他写作了诸多关于中国的著述，还翻译了一些重要的中国典籍，如《尚书》《庄子》《道德经》《易经》等，其中《尚书》英译本于2014年由著名的企鹅出版集团推出。其翻译当时的语境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特点，反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兴起，产生了新的文化与文本形态。

## 2. 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语境

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美国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

1) 钱宗武、秦力译注，《前言》，《尚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勒 (Edwin Gentzler)、玛丽亚·提莫志克 (Maria Tymoczko) 等学者认为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应注重将其重置于翻译当时的历史语境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如图里提出, “任何试图对翻译文本提供详尽的描述和可行的解释都需要适当的背景化、语境化, 而语境对于给定的翻译案例总是具体、特定的, 且绝非已充分显现。”<sup>2)</sup> 提莫志克认为, “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时, 会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 并加以扩展, 将之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sup>3)</sup> 因此我们对彭马田《尚书》英译的主要语境因素进行分析, 以便研究与把握其译文的特点。

### 1)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美国许多学科出现了关于新的历史-社会学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社会、文化领域, 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 这种变化具有反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倾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后现代”一词被广泛引入文化理论领域。后现代文化形式迅速扩散, 在法国, 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构成了自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以来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断裂。法国学者接受了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和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的思想, 促使法国理论“背离黑格尔、马克思、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转向发展一种新的理论形式”, <sup>4)</sup> 并最终产生了后现代理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后现代主义者们频频向正统观念发起攻击, 哲学、文化、理论及社会理论等领域的后现代倡导者们“号召用新的范畴、新的思维和写

2)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Revised edition, Tel Aviv Universit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2012, p.23.

3) 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p.25.

4)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17-18页。

作模式、新的价值和政治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不足。”<sup>5)</sup> 诸多欧洲和北美学者把后现代概念引入了历史学、社会理论与艺术领域。英语世界爆发了同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理论决裂的最激烈的论战，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sup>6)</sup> 法国理论界宣称历史出现了后现代断裂，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渗透到了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话语之中，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法国学者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等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西方哲学和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是有害的价值体系，否定意义的再现图式，认为语言的能指比所指更为重要，具有动态生产性和不稳定性。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甚至宣布了“人的消亡 (death of man)”。<sup>7)</sup> 1979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描述了后现代的一些状态，“以此标志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s) 和现代性希望的终结”，<sup>8)</sup> 其某些观点也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契合。美国学者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1943-) 则认为后现代话语抛弃了现代话语和实践，是新的艺术、文化与理论观点。<sup>9)</sup> 正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以自由的、有时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破除权威话语，对传统感兴趣并加以利用和颠覆，对所有约定俗成的概念，都提出了疑问。<sup>10)</sup>

5)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33页。

6)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4页。

7)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31页。

8)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31页。

9)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27-33页。

10)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 《译者前言》,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田晓菲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IV-V页。

## 2) 大众文化产业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思潮源于美国而扩散到世界各地，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回应。随着整个世界的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形成了一种趋同性、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人们被商品包围，自身也变为文化过程中“可互相置换的部件”。<sup>11)</sup> 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踏入新的旅程，这个新社会被称为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媒社会、讯息社会、电子社会”。<sup>12)</sup> 美国学者詹姆逊 (Jameson Fredric, 1934-) 和哈维 (David Harvey, 1935-) 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后现代是资本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其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上的渗透和均质化 (homogenization)”，继而导致了“更进一步的文化碎裂 (fragmentation)、时空经验的改变，产生了经验、主体性和文化的崭新式”。<sup>13)</sup> 因此后现代文化现象实际上是处于文化外的一股新潮流在文化范畴内的表现，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着新产品不断被产出，并以更快的速度收回成本，翻新利润。从而在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y) 的统辖下，产生了一种新文本，其内容开式及经验范畴皆与昔日的文化产品大相径庭。<sup>14)</sup>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给人以历史感趋于消退、变化的感觉，后现代思潮甚至导致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的形成。而且后现代文化也给人一种全新的缺乏深度的感觉，这种“无深度感”不但能在当前社会以“形象 (image)”及“模拟体 (simulacrum)”为主导的新文化形式中经验到，甚至也存在于当代“理论”的论述之中。<sup>15)</sup> 处身于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英国汉学家彭马田 (Martin Palmer) 的《尚书》

11) [美] 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12)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3-430页。

13)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3-430页。

14)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3-430页。

15)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英译也显示出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尚书》英译的特点。

### 3. 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随着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探求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西方对中国文化也更为关注。近年来，西方推出了《易经》《道德经》《庄子》《论语》等诸多中国古代典籍的新译本，其中即包括英国汉学家彭马田的《尚书》英译。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和大众文化产业的影响下，世界最大的大众英语图书出版商之一——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规定，其出版的翻译著作必须使用现代英语，译文一定要可读性强，能够引人入胜。按照有关出版要求，彭马田与英国诗人杰伊·拉姆塞(Jay Ramsay)、英国艺术史学家维多利亚·芬利(Victoria Finlay)合作英译了《尚书》。<sup>16)</sup> 受其翻译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彭氏《尚书》英译具有显著的后现代文本特色。

#### 1) 译文形态趋于简化、拟像化

彭氏的《尚书》英译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运用了意译为主的翻译方法，译本对原文语义多有删减等改动，语义诠释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因而原文的语言文化蕴含没有得到真实、完整的诠释，从而表现出简化、拟像化的后现代文本特色。

例如，翻译《虞夏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考察往事，帝尧名叫放勋。) <sup>17)</sup> 彭译：“Long, long ago there lived the Emperor Yao.” <sup>18)</sup>

第430-433页。

16)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17) 江灏、钱宗武译注. 《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

(从前有个皇帝叫尧。)可见彭氏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意译的翻译方法,并未按照原文词语顺序直译,并删去了原文“曰放勋(名叫放勋)”的语义,其译文与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尚书》英译相比,有较大简化。如理译:“Examining to antiquity, we find that the emperor Yaou was called Fang - heun.”(考证古文,我们发现尧帝被叫做放勋。)<sup>19)</sup>高译:“Examining to antiquity, (we find that) the emperor Yao was called Fang - hün.”(考证古文,我们发现尧帝被叫做放勋。)<sup>20)</sup>上例中,理、高译文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与直译的翻译方法,完整准确地传译了原文,而彭氏英译则漏译了原文语义,丢失了一些中国文化特有的元素。

再如,翻译《虞夏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我想显示古人衣服上的图象,用日、月、星辰、山、龙、雉六种图形绘在上衣上,用虎、水草、火、白米、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黑青相间的“巳”字花纹绣在下裳上。)<sup>21)</sup>彭译:

“I need to be aligned to the emblems of the past which our ancient ones studied and described ..... the sun, moon, the stars, the mountains, dragons, flowers, and insects embroidered on the robes. All these symbols: monkeys, fire, fine rice, the axe all designed in the finest silk of the five colours.”(我需要与我们古代研究和描述的过去的象征保持一致……太

页。

18)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63.

19)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M].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p.16-17.

20) Bernh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J].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2, 1950, p.1.

21)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阳、月亮、星星、山脉、龙、花和绣在长袍上的昆虫。所有这些象征：猴子、火、精米、斧头，都是用五种颜色中最好的丝绸设计的。) 22) 对照原文语义，可发现彭氏漏译了“藻（水草）”与“黼（黑青相间像两个‘己’字相背的花纹）”。宗彝即宗庙彝樽，郑玄注：“宗彝，虎也”，孔颖达疏：“周礼宗庙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为虎彝也。” 23) 周礼规定宗庙彝樽上面刻有虎和长尾猿，此句用其指虎和长尾猿的图形，而彭氏译文将其简译为“猴子(monkeys)”，且并未如其他时期《尚书》英译那样对有关词语进行意义的补充诠释，因此原文词语所负载的中国思想文化蕴含也随之丢失，其译文多处可见这种漏译和删减现象。

又如，翻译《周书·秦誓》，原文仅约308字，彭氏英译竟然漏掉近40字未译。以下词语语义在彭氏译文中踪迹难寻：“是多盘”，“是惟艰哉”，“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其如有容”，“是能容之”，“是不能容”。24) 由此可见其译文较大的简化，且多趋于表面化、拟像化的诠释传译。有关译文分析如下：

例如，翻译“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古人有话说：‘人都随心所欲，就会多出差错。’责备别人不是难事，受到别人责备，听从它如流水一样地顺畅，这就困难啊！”）25)

彭译：“The old ones had a saying, you know, The people always prefer an easy way of life. It's easy to criticize them for this, but hard to do so without some degree of hypocrisy!”（古人有句话，你知道，“人们总是喜欢轻松的生活方式。因此批评他们很容易，但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虚伪，就很难做到！”）对比原文语义，可发现在译文中，“是多盘”与“是惟艰哉”没有对应

22) 英译例句的中文译文为笔者所译，下同。

23) [汉] 孔安国传，[唐] 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66-170页。

24)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p.280-281.

25)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366页。



语义。译文对原文某些词语的表面化的诠释导致了一些误读，如其将“自若”望文生义地翻译成“自在轻松的生活 (an easy way of life)”，而原文意为做事情“随心所欲”，因此会因太放纵自己，不明事理、是非不分而犯错，含有使人警醒之意。而彭氏译文竟然删去了表示“自若”可能导致的后果——后半句“是多盘”，从而使得原文整体语义逻辑模糊难辨，仅可说是拟像化、部分地传译了原文语义。

类似的，翻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伋伋勇夫，射御不违，惟截截善谗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白发苍苍的善良官员，体力已经衰退了，我还是亲近他们。强壮勇猛的武士，射箭和驾车都没有失误，我还是不大喜爱。只是那些浅薄善辩的人，使君子容易疑惑，我过多亲近他们！”）<sup>26)</sup> 彭译：

“As for the young bucks who delight in hunting and riding I haven't got time for them now. And as for the superficial charmers who turn a true man from the Way I neither need them, nor does the Emperor.”（至于那些喜欢打猎和骑马的年轻人，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至于那些肤浅的谄媚者，他们使一个真正的人变得偏离正道，我既不需要他们，皇帝也不需要他们。）

上述译文显示，彭氏未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意为我过多亲近他们，表示为自己亲小人的不当行为而后悔、自责。而彭译为，“我既不需要他们，皇帝也不需要他们。”可见其译文不但简化，与原文语义差异也较大，有些原文在译文中语义难辨，仿佛只剩下模糊的影子。

又如，翻译“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果有一个官员，诚实专一而没有别的技能，他心地宽广能够容人）”。彭译：“One true minister, pure and simple, without any other qualities but a heart and mind at rest”。（一个忠实的大臣，纯洁而简单，除了平静的心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品质。）上例中，彭氏漏译了“其如有容（他心地宽广能够容

26)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人) ”的语义。对于“是能容之(这种能够宽容待人)”, “是不能容(这种不能够宽容待人)”, 彭氏将其简译为“像这样的人(A man like this, such a man)”。同样地, 翻译“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 彭译: “A man like this will care for my heirs and people!”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 彭译:

“Such a man will never protect my heirs or my people!”<sup>27)</sup>

由以上《周书·秦誓》的英译可见, 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彭氏的一些译文诠释过于简化, 表意不明, 影响了对原文整体语义的真实、完整传译, 正如有研究者所言, 其译文趋于“浅化”、“概括化”,<sup>28)</sup> 而这些特色正与后现代主义文本相契合。

## 2) 译文诠释深度消失、趋于平面化

正如詹姆逊所言, “后现代主义显然地表面化, 并专心探讨字面上极端肤浅的意义,”<sup>29)</sup> 凯尔纳论及后现代理论家时也曾说, 现在许多人已不再可能“像马克思发现隐藏在意识形态之下的阶级利益或像弗洛伊德发现隐藏在文本或个人行为之后的无意识情结那样, 描绘出事物的‘纵深’维度——一种底层实体或结构”。随着“深度被夷平”, “历史和经验也就因此被碾平了(falttens out)”, 人们“迷失于后现代主义”, “疏远了那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意识”。<sup>30)</sup> 从彭氏的《尚书》英译文本中, 也可发现这种历史意识淡化、文本诠释深度消失的传译特点。

彭氏之前的《尚书》译者们, 如19世纪英国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27)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p.280-281.

28) 葛厚伟, 《协调与过滤:〈尚书〉古典服饰文化英译研究》,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2022年版, 第84-90页。

29)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序》,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岛子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年版, 第20页。

30) [美]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303页。

Medhurst, 1796-1857)、理雅各, 20世纪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 皆注重对原文词语进行引经据典的考证, 在历代有关诠释传统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深度诠释。理雅各的英译尤以诠释内容厚重丰富而长期被西方奉为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相反地, 彭氏不但简化了原文的语义传译, 而且抛弃了补充有关词语注释等传统翻译诠释方法, 仅附录了一些简短的人物说明, 因此导致原文的思想文化蕴含在翻译中大为减损。其译文并未如其前诠释者那样深度诠释传译原文, 而呈现出平面化的特点。例如, 翻译《尚书·尧典》: “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他能发扬大德, 使家族亲密和睦; 家族和睦以后, 又辨明百官政事; 百官政事辨明了, 又使万邦诸侯和顺。普天下的民众于是变得善良和睦。)<sup>31)</sup> 这段话本是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明俊德”即“修身”, “亲九族”即“齐家”, “平章百姓”即“治国”, “协和万邦”即“平天下”。将彭氏与理氏对这段话的翻译相比较, 可见彭氏既删减了原文语义, 又未深入诠释文中应有之义, 其译文尽管通俗易懂, 却失去了原文特有的文化意蕴。如彭译:

“In him were combined all that was best from his ancestors and all that will be best of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As a result, he was enlightened and virtuous and so he was able to make sure that the whole world lived in balance and harmony. This meant everyone lived in a state of enlightenment and even the surrounding states and tribes lived peacefully.”(他身上融合了所有来自其祖先与未来几代人所具备的最好的东西。因此, 他开明而贤德, 因而能够确保整个世界生活在平衡与和谐之中。这意味着每个人都生活于开明状态, 甚至周围的国家和部落也平静地生活着。)

理译:

“He was able to make the able and virtuous distinguished, and thence proceeded to the love of the nine classes of his kindred, who all

31) 江灏、钱宗武译注, 《今古文尚书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3页。

became harmonious. He also regulated and polished the people of his domain, who all became brightly intelligent. Finally, he united and harmonized the myriad States of the empire; and Lo! The black haired people were transformed. The result was universal concord.”<sup>32)</sup>(他能够使能者和贤者脱颖而出, 进而得到了九类同族的爱戴, 他们都变得和谐起来; 瞧! 黑头发的人被改造了, 结果是普遍的和谐。)

彭氏译文不像理氏译文那样, 在同页面的译文下方附有译文数倍的注释, 即将原文中的某些词语依次以英文诠释, 补充其语言文化意义, 如其注释: “克明俊德, 俊在《大学》中通峻, 那里的意思是尧自身的伟大德行。”“九族, 指所有同姓的血亲, 从太祖(the greater-greater father)到曾孙(the greater-greater son)”, 除了注释“百姓”、“平”、“万邦”、“黎”等字词的语义, 还引用了汉代学者孔安国的注解作为句子含义的说明: “天下众民, 皆变化从上, 是以风俗大和。”<sup>33)</sup> 这样, 理氏通过译文与注释对原文进行了深度语义诠释, 采用异化、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保留了诸多中国语言文化特有元素。而彭氏译文却与理氏译文差异很大, 删减了“以亲九族(使家族亲密和睦), 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辨明百官政事)”、“百姓昭明(百官政事辨明)”等原文语义, 仅进行大致意译, 其译文较之理氏译文大为简化, 漏掉了原文较多重要文化信息, 趋于似是而非、拟像化的表述, 将“修、齐、治、平”的重要儒学思想丢弃大半, 传译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形在其译文中并非少见。

再如, 翻译《尚书·虞书·大禹谟》: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现在人心动荡不安, 道心幽昧难明, 只有精诚专一, 实行中正之道。)<sup>34)</sup>”

32)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M].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7.

33)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M].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7.

34) 江灏、钱宗武译注, 《今古文尚书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9-30页。

彭译：

“The heart and mind of the people is fickle. So be careful: be constant, stay on the Middle Path.”（人心变化无常。所以要小心：始终如一，走中庸之道。）

上述这段《尚书》文本寓意深刻，影响深远。后世称之为“虞廷十六字诀”，又被称为“十六字心传”，是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中”这个哲学命题和执政理念。“人心惟危”，即人心动荡危险，而彭氏翻译为“人心变化无常”，“道心惟微”的语义在译文中不见踪影，“惟精惟一”，即必须精诚专一，而彭氏译为“所以要小心：始终如一”，精诚之意被减损，或被望文生义而翻译成了“小心 (be careful)”。对“允执厥中”仅按照字面意义翻译成“走中庸之道 (stay on the Middle Path)”，并无有关注释进一步补充诠释其真正的意义。由此可见，其译文对原文的简化与语义偏离，导致原文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蕴含几乎被消解殆尽。

彭氏对历代《尚书》诠释的忽略，也表现出对传统诠释翻译思想方法的反叛和对历史真实的漠视。这正如彭氏在其译本序言中所言，他们要通过新的诠释，“使这部被世人认为很重要而又会很枯燥的古代经典鲜活起来，使读者不会再感受到儒学的循规蹈矩，也不再有机械记背原文注解的压力。”<sup>35)</sup>可见为了满足文化产业语境下的西方大众阅读需求，彭马田等抛却了以异化、直译为主的深度翻译传统，其译文与其前《尚书》英译形态相比，无论外在形式还是语义诠释，都可谓大相径庭，而这也正契合后现代主义“明目张胆地反现代主义传统，”“反现代主义形式价值之道而动”<sup>36)</sup>的特点。诠释深度的消失、传译的平面化，导致了译文未能充分而真实地向英语大众读者传播《尚书》原文的语言文化思想，因而给人以“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而这也“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

35)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63.

36)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序》，《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sup>37)</sup>

### 3) 译文能指与所指趋于分裂

“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sup>38)</sup>是由所指和能指结合而成的整体，所指和能指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而“翻译具有符号转换性。这一点也是翻译恒定不变的特质，”<sup>39)</sup>因此翻译可看作从源语到目的语的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和意义再现，即将源语的能指转换为目的语能指，以再现源语意义。对此，有学者提出，翻译“应尽量再现目的语文本能指的指涉空间，即还能指以能指”。<sup>40)</sup>“目的语文本能指的指涉空间”即原文的能指及其所指意义空间。若目的语译文能指未能再现原文能指，则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裂”，<sup>41)</sup>而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彭氏《尚书》英译即表现出这种能指与所指分裂的特点。

如《虞夏书·五子之歌》的翻译，彭氏以诗歌化译文大致传译了君主失道、亡国等历史故事与原文强烈的谴责、羞愧、悔恨等情感。但细读之下，虽然译文总体上与原文的主要人物、事件、情节等一致，但显然多处译文与对应的原文存在程度不同的语义差异，有的译文能指仅仅传译了部分原文语义，有的则仅能从中看出原文语义的模糊轮廓，只能算与原文语义大致相关，有些译文甚至与原文语义无关，令人不知所云。如“弗慎厥德，虽悔可追？”意为“平时不注重自己的品德，即使现在想改悔，难道还来得及补救吗？”<sup>42)</sup>而译文翻译为“我

37)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3-430页。

38)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1-102页。

39) 刘巧玲、许钧，《如何拓展翻译研究视野——许钧教授访谈录》，《中国翻译》第2期，2021年，第87-93页。

40) 陈历明，《从能指到所指？——文学翻译个案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2006年，第123-128页。

41)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3-430页。

努力地思考，但他们又怎能被原谅？（I try to think, but how can they ever be forgiven?）<sup>43)</sup> 可见其语义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未能准确还原译文能指的语义指涉空间，未能传译出原文所指“不注重品德”之义。这种情形在彭氏译文中较为常见。

再如，翻译《尚书·微子》：“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隳。”（殷商如果现在有灾祸，我不会去做敌人的奴隶。我劝告王子逃出去。我早就说过箕子、王子应该逃出去，如果不逃出去，那我们殷商就要灭亡了。）<sup>44)</sup> 彭译：

“Now disaster is poised to come down  
and I must acknowledge my part in this. When we fall,  
I will never serve as a minister again.  
So listen to me, my master. Leave, as fast as you can – escape.  
I did not serve you as well as I should have –  
but now, listen to me – and run!  
Otherwise we face complete annihilation.”<sup>45)</sup>  
(现在灾难即将降临  
我必须承认我在其中的作用。当我们跌倒时，  
我再也不会当大臣了。  
听我说。我的主人。  
尽快离开——逃离。  
我没有尽我所能为你服务——

42)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43)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99.

44)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

45)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158.

但现在，听我说，然后跑掉！

否则，我们将面临彻底的毁灭。）

上例显示，译文诗句基本按照原文顺序传译，但第一句“商其沦丧”中，“其”，意为“如果”，而彭氏译为“即将”（is poised to）。“商”指殷商，译文漏译此意。译文能指有所偏离原文能指的语义所指。第二句“我罔为臣仆”对应的彭氏英译（and I must acknowledge my part in this. When we fall, I will never serve as a minister again.）意为：我必须承认我在其中的角色，当我们被打败时，我再也不会当大臣了。而原文能指意为：我不会去做敌人的奴隶。显然译文增添了原文所没有的语义，却没有准确传译出“臣仆”的语义，即古代战败者会被当作奴隶。原文此句有表明自己作为臣子的忠心之意，然而译者并未传译出此义，因此译文能指语义偏离原文所指而未能再现其能指空间。第四句：“我旧云刻子”本该对应诗句“I did not serve you as well as I should have”（我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为你服务）。但原文并非此义，而意为“我早就说过箕子、王子应该逃出去。”在没有注释等补充诠释的情况下，此处诗句读来令人不知所云，译文能指完全背离了原文能指的语义所指。最后一句：“王子弗出，我乃颠隤，”意为：如果不逃出去，那我们殷商就要灭亡了。对应译文诗句为：“So listen to me, my master. Leave, as fast as you can - escape.”（但现在，听我说——快跑！否则我们将面临彻底的毁灭。）此句本为臣子在国家存亡关头对君主的郑重规劝，虽然译文也表达了让主人逃跑之意，但同第三句译文一样，皆因过于口语化，而未能准确传译出君臣对话应有的庄重等语义。由此可见，彭氏《尚书》译文的能指未能真实、完整地还原原文的能指空间，从而未能真实传译其所对应的语义所指，因而显示出趋于“‘能指’完全自动、语言的意义搁在一旁”<sup>46)</sup>的后现代主义新文本的诠释特征。

46) 张谔，《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哲学特征》，《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2018年，第157-164页。



#### 4) 英语大众读者对中国经典译文的距离感消失

在翻译中,使得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文化蕴含的中国古代经典译文能为西方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这绝非易事,而彭氏等却基本做到了。而这正是因其简化了原文的语义信息,剥离了其历史纵深,拟像化地将这部中国古代经典传译给西方大众。

首先,彭氏译文以西方民众所熟悉的叙事方式进行传译,更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尚书》的主要内容是君王的诰诫、誓命以及君臣谈话记录,彭氏称之为“演说体”,其译文采用了西方讲述历史故事的传统叙事手法,简明而通俗,贴近西方大众读者。如翻译《虞夏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考察往事,帝尧名叫放勋。) 47) 彭译:“Long, long ago there lived the Emperor Yao.” 48)

(从前有个皇帝尧。)可见其并未逐字直译原文,而是大致交代了故事中的人物,且忽略了有关尧名字的原文语义。对此,彭氏在其译本前言中谈到,他原本晓得翻译“曰若稽古”,更好的译文应是:据说如果我们考察古代之事(It is said if we investigate back into antiquity),而之所以选择了西方讲述古代历史、英雄题材故事时的开篇常用语Long, long ago (从前),是因为这才是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表达。49) 彭氏译文所体现的翻译理念契合了后现代主义者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一部中国政史经典归化传译为了一本通俗的历史故事书,西方大众读者自然易于阅读这样的译文。

其次,彭氏《尚书》英译大量采用诗歌、散文,表述简明,更容易为普通大众英语读者阅读。在58篇《尚书》译文中,有38篇含诗歌形态,如传译《虞夏书·五子之歌》等原文诗歌语篇,对于有些非诗歌篇目也几乎通篇采用诗歌形态的译文,如《周书·秦誓》《商书·微子》《商书·太甲下》《周书·微子之命》等。正如有

47)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48)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63.

49)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13.

学者所言,译文“表现出西方现当代自由诗模式个性化、形式开放化、节奏散文化”等特征。<sup>50)</sup>为了采用这些新的诠释形态,彭氏删减原文语义,抛却传统翻译诠释方法,从而使得西方大众读者阅读中国古代经典的难度大为降低,而这也正是他们适应大众文化产业需求的翻译理念。为此,他们主要注重将原文韵律化,打造新的译文形态,而非深究原文的思想文化内涵。如合作译者拉姆塞认为,“在如此古老的典籍中,重要的是需要去反思其内容是怎样作为鲜活的词语而被接受、记忆。”于是他们“合作探索《尚书》文本的韵律,并将一些关键章节的译文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编写,以期再次为文本注入生命气息,使其适合现代阅读(So to bring this material alive as it deserves for a modern readership)”。<sup>51)</sup>而这也正符合后现代文本诠释的特点:即“更倾向于将史著形式文学化”,通过“情节设置(emplotment),使历史故事变得生动诱人”。<sup>52)</sup>

彭氏简化、通俗的《尚书》译文形态也是受到西方大众文化产业制约与影响的结果。彭氏英译可说是后现代大众文化产业的一种新产品。在商品规律的影响作用下,彭氏等对《尚书》的英译须符合资本运作的要求,而平面化、简化、形态新颖的译文正可达到快速产出新产品的目的。彭氏对原文传译的反传统化、通俗化等翻译方法策略,具有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消除西方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距离感的作用。在当今社会文化的众多领域,大众文化产业在逐渐取代精英文化而占据优势。正如詹姆士所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姿态,我们今天的群众不但易于接受,而且乐于把玩,其中的原因在于后现代的总体已被现存的社会体制所吸纳,跟当前西方的正统文化融为一体了。”<sup>53)</sup>彭氏《尚书》英译面世后,受到了西方读者的欢迎,<sup>54)</sup>可见其在一定程度上较能满足当今大众

50) 葛厚伟,《传神达意 传播儒学——Martin Palmer〈尚书〉英译本介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2017年,第40-43,127-128页。

51)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16.

52)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呼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53)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9页。

文化所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尚书》皆被统治阶层奉为修身、齐家、治国、经世的大经大典,应属所谓“高等文化”范畴,而如今却被彭氏诠释传译为一种大众文化通俗读本。这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感经验范畴,今天后现代主义把两者之间的界限彻底取消了”。<sup>55)</sup>因而西方大众对中国经典及其译本的距离感也随之消失。

#### 4. 彭马田《尚书》英译对翻译伦理的背离

彭氏《尚书》英译不仅表现出对《尚书》诠释传统的反叛,也显示了对历代众多译者所长期坚守的翻译伦理的背离,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在后现代大众文化语境的影响下,彭氏运用了与原文所属文化不同的西方思想文化框架构建译文,对原文进行了过度归化的翻译与诠释,从而消解了原文的中国语言文化特征,添加了原文不存在的西方思想文化元素。

##### 1) 翻译伦理与《尚书》的诠释传统

学界对于翻译伦理问题有过诸多探讨,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学者贝尔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认为,“忠实是翻译的自身目标和内在需要,提出翻译伦理在于尊重他者作为相对于自我的另一种存在的他异性。”因此提倡尊重“原作语言、文化的异质性”。<sup>56)</sup>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1

54) 王碧薇,《我为什么热衷于翻译〈尚书〉——访英国汉学家Martin Palmer(彭马田)》,《党建》第11期,2015年,第60-63页。

55) 张谔,《詹姆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哲学特征》,《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2018年,第157-164页。

56)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2016年,第70-77页。

953-) 认同贝尔曼的观点, 并提出翻译的伦理目标在于“对不同于本土语言的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理解与尊重”。<sup>57)</sup> 鉴于各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他提出了翻译的“差异性伦理”, 提倡保留异域文本的异域性, 主张异化翻译, 与对抗本土文化的主流价值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少数化翻译”。尽管有关翻译伦理的讨论中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 忠实于原文也是长期以来翻译领域的重要传统。许钧教授曾指出, 在目前“‘忠实’概念不断遭到质疑和解构”的现状下, “对忠实原则的坚守、对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既是翻译伦理的本质诉求, 也是思想、文化得以传承与传播的必要条件。<sup>58)</sup>

由于《尚书》具有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等独特价值, 对其进行诠释的历代中外学者向来注重忠实于原文语义。汉儒、宋儒、清儒如此, 诸多西方汉学家, 如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顾塞芬 (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麦都思、理雅各、高本汉等亦如此。因此彭氏的《尚书》英译可说是对这种忠实与原文的翻译传统的反叛。

## 2) 彭氏《尚书》英译对翻译伦理的背离

彭氏《尚书》译文与历史上其他《尚书》译文形态皆大相径庭。其所谓“更为精彩的翻译”<sup>59)</sup>也正显示了反传统、求新颖的后现代主义特色。然而其译文由于一味强调新颖、易读性, 而过滤、简化了诸多原文语义信息, 对原文某些段落的语句顺序作了变动, 再加上不求甚解的诸多误读, 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较低, 原文特有的语言文化元素得不到应有的诠释与传译, 大众读者也难以了解原文的真实面貌。因此, 彭氏的《尚书》英译与韦努蒂等学者所提出

57) 刘云虹、许钧, 《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 2016年, 第70-77页。

58) 刘云虹、许钧, 《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 2016年, 第70-77页。

59) 王碧薇, 《我为什么热衷于翻译〈尚书〉——访英国汉学家Martin Palmer (彭马田)》, 《党建》第11期, 2015年, 第60-63页。

的尊重异域语言文化的他者性，在翻译中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进行异化翻译等翻译伦理的要求相违背。正如有学者所言，“相比而言，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低，与原文的文化距离较大。”<sup>60)</sup>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不但消解了原文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而且将原文纳入西方思想文化框架进行诠释，添加了一些原文未有之意。例如，在其《尚书》英译本序言里，身为宗教历史学家的彭马田，在否定了《尚书》文本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同时，又将其归入古老的萨满教(shamanic practice)文化。他认为：“尧、舜、禹是中国古代三位最伟大的半神统治者。说他们是半神的，因为其可能与萨满教的实践保持一致，结合了牧师和国王的角色（见第五章），萨满教和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两大宗教体系。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贯穿在《尚书》的前几章”。彭氏还以《虞书·益稷》篇的“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等句为例，证明《尚书》所载乐官夔指挥演奏乐器时，那些“戏剧性的结果出现”<sup>61)</sup>的原因即是萨满教实践和祖先崇拜。彭氏的做法正如方环海教授所言，“抹杀了中国语言作为世界语言个体的具体可感特征，抹上了一层西方语言的东方主义色彩，”“将‘中国形象’符号化、简单化、抽象化、刻板化、定型化为容易把握的参照物”。<sup>62)</sup>也有学者认为此类翻译是“为贴合西方主流道德文化叙事而改写”，即“以中国经典为载体，而以西式价值观为内核”。<sup>63)</sup>一部分英语读者已发现彭氏《尚书》英译的某些失真之处，他们对此感到疑惑，“更加期待读到‘原汁原味的东方文化’”。<sup>64)</sup>可见异语读者仍有对忠实于原文

60) 葛厚伟,《〈尚书〉农业术语英译的文化折射及其认知识解》,《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2023年,第120-125页。

61)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p.25.

62) 方环海,《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63) 李耀,《翻译传播学视域下〈尚书〉译介社会模式研究》,《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第6期,2022年,第113-117页。

64) 李耀,《翻译传播学视域下〈尚书〉译介社会模式研究》,《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第6期,2022年,第113-117页。

的译文的迫切需要，而这也正体现了翻译的本质特点与意义，而彭氏《尚书》英译显然未能完全满足英语读者们的这种需求。

翻译伦理即是译者忠实于作者的一种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具有约束性与普遍性。翻译伦理是所有译者需要共同遵守的原则，其存在的价值在于维护原文的真值，也即核心价值。据此，彭马田的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尚书》英译在诠释与传译原文核心文化价值上存在较严重的缺陷，尽管其对中国文化的大众传播具有一定的作用。

## 5. 结语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彭马田的《尚书》英译具有大众文化产业的特有印记。译文对《尚书》的诠释与传译趋于简化、平面化、拟像化，诠释深度消失，与西方大众的距离感消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新文本。彭氏英译背离了根本的翻译伦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此类中国经典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真实传播与交流，也不利于西方对中国文化有关误读、曲解的消除。

古代经典与现代读者的距离感特别是西方读者对中国经典译文的距离感，是中国经典英译仍需着力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尚书》之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础、古老的典籍，若被后现代主义文本化，尽管或许不是作者主观认识所为，这类英译也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真实传播，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更容易普及，而西方大众读者并未能真正了解中国典籍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会形成不当甚至错误的有关认识。因此，这种严重减损中国经典文化价值的翻译越普及，读者对其认识也越固化，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损害也越大。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尚书》英译必须消弭与西方读者的距离感，总结后现代主义经典翻译的经验和有效方法路径，也应该坚守《尚书》英译的优良传统，坚守翻译伦理，坚守经典原文的核心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

不同文明的互鉴互惠，以有利于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研究，对于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研究，对于如何实现“把中国思想文化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真实地传达给世界这个根本目标”，<sup>65)</sup>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真正的中国文化等，皆具启示意义。

---

65)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2016年，第70-77页。

## 參考文獻

- 安吉拉·默克罗比,《译者前言》,《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 蔡沈,《书集传》,钱宗武,钱忠弼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 陈历明,《从能指到所指?——文学翻译个案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2006年。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方环海,《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 葛厚伟,《传神达意 传播儒学——Martin Palmer〈尚书〉英译本介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2017年。
- 葛厚伟,《协调与过滤:〈尚书〉古典服饰文化英译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2022年。
- 葛厚伟,《〈尚书〉农业术语英译的文化折射及其认知解》,《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2023年。
- 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 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2016年。
- 刘巧玲、许钧,《如何拓展翻译研究视野——许钧教授访谈录》,《中国翻译》第2期,2021年。
- 李耀,《翻译传播学视域下〈尚书〉译介社会模式研究》,《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



学报》第6期, 2022年。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序》,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岛子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年版。

王碧薇, 《我为什么热衷于翻译〈尚书〉——访英国汉学家Martin Palmer (彭马田)》, 《党建》第11期, 2015年。

詹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张旭东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张谡,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哲学特征》, 《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 2018年。

Bernh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J].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2, 1950.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M].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Martin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 (Shang Shu)*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 Abstract

### A Study of Martin Palmer'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ang 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Shen Siqin

*Shang Shu*, the oldest classic of Chinese n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media and carriers of the core values of the nation. Throughout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many interpretation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Now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constraints of mass industrial culture, Martin Palmer,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sinologists, translated *Shang Shu*, dispelling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oad of the original text, as well as its connotation, which le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ense of distance between English readers and the version of this classic. Palmer's version presents some features of Postmodernism texts, such as simplification, simulacrum, flattening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epth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and it has a low level of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deviates from translation ethics and is to some extent detrimental to English readers' true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Shang Shu*.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 Martin Palmer, *Shang Shu*, Chinese classic, Postmodernism, translation ethics

|                                                                                       |
|---------------------------------------------------------------------------------------|
| 투 고 일 : 2023. 10. 10. / 심 사 일 : 2023. 10. 15. ~ 2023.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3. 11. 20. |
|---------------------------------------------------------------------------------------|